

青未了

人文 齐鲁

*口述城事

济南老火车站百年祭

从爷爷到儿子到孙子,三代人的情缘;从普列到动车又到高铁,百年间的情怀;从老站到新站到高铁站,空间时间的变幻,纵横交错,焦点依旧是永远不能忘却的那座火车站。

□王晓瑜

呼啸叱咤的高铁倏然而至,气势恢宏的济南西客站也轰然而起。风驰电掣的铁轮已整整碾过了一百周年。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百年前洋人来给中国铺铁路修车站,现在轮到我们的高铁要走向世界直通欧洲了。

这个本应欢庆的季节,无奈那永远也抹不去的心痛却不合时宜地越发在心头缠绕,下意识为一个幽灵默默地祈祷祭奠。一百年前的今天,济南老火车站揭开了它婀娜多姿的盖头,一下成了济南的地标景观,成就了一向虚荣的泉城人半个世纪的荣耀,然而二十年前它却神秘无情地悄然逝去。

最早听说济南火车站,还是我孩提时在几百里外的老家。结结巴巴的父亲断断续续在讲述着。1943年,家乡遭受冰灾,加上兵荒,父亲携妻儿老小伙同邻居踏上了闯关东的漫漫长路。出门就逃难般涌到济南火车站,偌大的候车厅活像是一个避难营,成千上万的逃难者在这里苟且偷生。夜晚,拥挤畏缩在连椅底下望着高高的拱形大窗直愣愣地发呆,不时还有一个日本鬼子来查良民证,连踢带踹,直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似的。好在偶尔钟楼上几声清脆的声响倒是增添了无穷的希望和勇气。后来在老乡的帮助下,

他们结伙爬上去沈阳的瓦罐车,蛰伏到山海关,才开始艰难求生之路。或许是火车站那灯塔般钟楼的吸引,在解放前夕他们还是决然返回了故里。

父亲和叔叔好像对济南火车站有一股特殊的情结,没事就描绘火车站的雄伟和天桥的高大。我们这些孩子总是提出“火车能站起来,天桥在天上吗”这些不着边际的发问,酷爱绘画的父亲和叔叔没事时,仅凭想象和记忆,竟能用手中的笔将济南火车站画得惟妙惟肖。父亲在村里一直给人扎纸草,除了纸人纸马,扎的最多的当然是他创作的济南火车站的工艺造型了。还经常说,他百年之后,别的都不重要,但这火车站必须要有,而且要周游世界。在父辈的熏陶下,我从小就对济南火车站产生了憧憬和崇拜。

上世纪80年代,我经常往来于省城之间,每次上下火车总像朝觐一样仰望那巍巍的钟楼高塔,也是在它的指引感召下,我如愿以偿地调济南工作,实现人生一大转折。那年春天,我携妻儿来生。夜晚,拥挤畏缩在连椅底下望着高高的拱形大窗直愣愣地发呆,不时还有一个日本鬼子来查良民证,连踢带踹,直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似的。好在偶尔钟楼上几声清脆的声响倒是增添了无穷的希望和勇气。后来在老乡的帮助下,

设计:德国著名建筑大师赫尔曼·菲舍尔(Hermann Fischer);

时间:1908年动工1912年建成;

地位:它是世界上唯一的哥特式建筑群落,是亚洲最大的火车站,并曾被战后西德出版的《远东旅行》列为远东第一站。

但见这座洋建筑以宽阔的南立面迎接拥抱客人,人口砌以宽大的花岗岩石台阶,与门前孔武有力的柱廊形成匀称、协调的沉实风格,传递给旅人一种笃实、稳定的感觉。候车大厅呈平面方形,拱穹高十几米,上覆双坡瓦屋面。南北两墙上嵌以宽大的拱形高窗,镶嵌着色彩斑斓的欧式玻璃。最引人注目的是候车大厅与辅助用房之间高高耸起30多米的圆形钟楼,堪称全部设计的点睛之笔,如果说它是世间汪洋人海中的一座小岛,那么这坚实而高耸的钟楼就宛若指引一叶小舟的灯塔,年幼的儿子似乎也悟出了点什么,直眯得出神。

意料不到的是,我们来济南不久,这座非凡的建筑,我们心目中的人生灯塔,竟在一夜之间被拆除了,永远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中……

那天晚上,我和儿子来到拆除现场,高高的钟楼早已轰然倒塌,往日喧闹的广场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建筑尸骨,废墟狼藉,惨不忍睹。有人悲愤,有人哭泣,有人捶胸顿足,还有人在边上烧香

磕头,用当地的习俗葬送这位共同相处了80多年的洋伙计。

凄凄未了情,丝丝怀念心。济南火车站成了我多年挥之不去的隐痛。每每出国去欧洲,总神牵魂绕地寻寻觅觅,苦苦寻找我那梦中故情,一碰到钟楼和拱形大窗就如获至宝,仔仔细细观赏,没完没了拍照。但左顾右盼,上下打量,个个却全然没有济南火车站的风韵和气度。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如一个人完全融入了异地生活习俗后反而不适应自己原本的故乡一样,置身本土的欧式建筑似乎缺少了济南火车站那种特有的地气和文脉。无独有偶,我儿子在英国读完书后也神差鬼使地到欧洲大陆去苦苦追寻了一番,也是怅然若失空手而回。

儿子现在在北京工作,火车往来是他抬腿常事。一再提速加快的列车,过去需要大半天的路程现在仅需几十分钟,就像同城坐有轨交通一样便捷高效,遗憾的是飞速的列车似乎将逝去的人文景观和真挚情感拉得越来越远。前几年经常听到有重修济南老火车站的动议,着实为之激动过。如今说得多了,也就听之任之,不以为然了。

从爷爷到儿子到孙子,三代人的情缘;从普列到动车又到高铁,百年间的情怀;从老站到新站到高铁站,空间时间的变化,纵横交错,焦点依旧是永远不能忘却的那座火车站。

饮饌琐忆

柳峪米粉

文·图/李海流

在老枣庄长大的人们,总忘不了那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的米粉。很多年以后,我一直在惦念着这个味道——枣庄米粉的味道,故乡的味道。

前段时间,去枣庄和朋友聊起小时候在中兴矿门口一起吃米粉的记忆,朋友说最近几年很少见到了,后来经过几番打听才知道这种米粉是在市中区的柳峪村纯手工作坊生产。对于60后、70后的人来说,在老枣庄走街串巷卖小米米粉的记忆总是那么温馨,那么留恋,因为它让我们忆起那段衣食不周的岁月。时代在变,社会在变,然而柳峪小米米粉的味道没变,还是我们儿时的味道,是碰触儿时记忆的味道!

说起米粉,你可能首先想到桂林米粉,过桥米线,如今在枣庄五区一市随便一找就能看到几家挂着桂林米粉,过桥米线的店铺,然而我这里所说的米粉不



做好的柳峪米粉

是这些异地米粉或者米线,而是老枣庄传统的用小米制作的米粉。小米米粉以前要想吃到一次你得有幸碰上,因为卖的人是走街串巷不固定的,现吃现做,所用的调料也比较简单——油炸过的干辣椒、新下来的青辣椒捣蒜、芝麻酱。每当有食客光临时,端上一碗米粉拌上调料便站在卖米粉的摊前大口大口地吃起来,那滋味至今难忘。

泛着微黄的小米米粉,很多人以为是凉面,其实外观看来的确像凉面,但它比凉面要细很多,进口以后有种和面条不一样的感觉,不像凉面爽滑,咀嚼起来很有劲道,回味时有一种小米特有的醇香。

米粉的制作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为此我还专门到市中区东外环的柳峪村实地采访了米粉加工的过程。据村中的一些老人讲,当年做米粉曾是柳峪人养家糊口的手艺活,村子里的很多人都靠卖米粉生活。近几年,由于做米粉受季节影响比较大,只能在每年的农历五月至九月全手工制作,不仅费时费力而且盈利空间小,到现在,村子里做米粉的只有四五户人家了。

每年清明过后,做米粉的人家都备好一年里所用的米粉原浆干粉。制作时先将小米用沸水烫过,再用清水浸泡一天有余,磨成米浆,然后装入布袋去除米渣、杂质,挤压去除水分晒干。夏秋季节,也是柳峪人最忙的时候,每天早晨,做米粉的人家都早早地起来,将春天备好的米粉干浆加水,打成稀浆,装入下端有筛眼的布袋中,慢压布袋,使米浆通过筛孔成细条状挤出,徐徐落入沸水锅中烫熟;捞起,用凉水冷却后沥干,即成米粉。

和许多上了年纪的老枣庄人谈起吃米粉,他们都会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一种沉迷于往事的记忆在言语之间流露出来。或许因为过于熟悉,很多人已经忘记“至味无味”的最高境界了。老枣庄人离不开米粉,米粉也早已融入老枣庄人的生活,吃米粉,不仅是一件口福乐事,更有一种家长里短的温馨亲情。



□苗得雨

1960年7月22日至8月13日召开的全国第三次文代会,毛主席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会议的第二天接见了全体代表。第三天,大家在《人民日报》上,看见放头题的照片,毛主席向代表们招着手,那手的前方正是山东的代表,我是靠手掌最近的一个,也特清楚。一个个欢笑的面孔,几乎都清晰可辨。大家都高兴极了,想不到这有历史意义的大会最为宝贵的一瞬间,却恰是自己与毛主席合影。会场上让代表们选洗照片,山东的代表差不多都特意将这份照片多加洗了一些。我加洗了三张,两张小型放大的,一张中型放大的。

这次会议共开了22天,是所有文代会开会时间最长的。“文革”前召开的三次文代会,这一次也是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共2444人。第一次是1949年7月,八百多人。第二次是1953年9月至10月,也八百多人。从团聚的意义上说,第一次是一个大团圆,是解放区与国统区文艺工作者的大会师。

1960年的夏天,三年自然灾害还未开始。这一次会议大的环境,总的状况还是好的。会议有规定,凡上届委员与各协会理

事,是这次会的当然代表,反右后不管甄别的和尚未甄别的,该到会的都到了会。像山东的王希坚,就照常参加了会。虽然如丁玲所说“坐的是冷板凳”。可以设想,若不是某些运动,还会有不少同志要参加会的。然而相比此后的十余年,还是一次有着相当意义的大团聚。

会议空隙里,山东代表团还去天安门前拍了一张合影,约上了中直代表团的陶纯、北京代表团的马少波和部队代表团的虞棘等山东老乡,也是山东文艺工作者的一次大团聚。每个代表团各方面的代表,也同时是各个协会代表团的代表。

作家协会,第一次文代会时叫文协,第二次文代会时改称作协,山东作协是1959年三次文代会时成立的,那时叫作协山东分会。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山东代表团共47人。团长燕遇明,副团长鲁特,刘知侠。文学方面有王安友、孔林、冯沅君、丁秀生、安林、严薇青、李宗谦、王希坚、陆佩如。我在文学方面。我们这些也是作代会的参加者,包括鲁特、知侠二位。戏剧方面是蓝澄、李时、王命夫、赵剑秋、郎咸芬、刘君秋、张春雷、王浚洲、张秀云、孟丽君、刘梅村、李师斌;音乐方面是张斌、张英、何锦文;美术方面是于希宁、

*忆海拾珠

一张珍贵的照片

在这张毛主席接见代表团的照片上,毛主席向代表们招着手,那手的前方正是山东的代表,我是靠手掌最近的一个,也特清楚。一个个欢笑的面孔,几乎都清晰可辨。

黑白龙、刘文泉;电影方面是方徨、励群、林祥福、曲源聚;舞蹈方面是于太赏、丁敏、祁本隆、孙丽、朱本圣;民间文学方面是董均伦、厉守禄;曲艺方面是郭文秋、邓九如、张军、李湘云;摄影方面是唐永平、王瑞华。

上世纪40年代的老文艺工作者和50年代的新秀,有代表性的,可以说包括了相当大一部分。包括后来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张斌、王命夫等,在毛主席接见时,都是衷心欣喜的面容。许多人想起以后浩劫中的经历,都感到这是一生中最幸福最宝贵的时刻。

这次会议,还有周总理作了国内外形势的报告,李富春作了国家经济建设问题的报告,陈毅作了国际形势的报告。周总理报告时一直站着,陈毅的报告特别生动,都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当时28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此次是第五次见毛主席。见周总理与听周总理报告也是数次了。想不到三年之后开始遭受批判,坎坷,曲折十余年。可是人不经艰难,受考验,长智慧,又怎能走向成熟?照片上的欢笑,是春风融融心境的流露,这心境也给我以久久的鼓舞。

这张毛主席接见代表团的照

片,因为在主席身边的是少奇同志,在“文革”中,照片的保存就成了难题。头一次抄家主要抄书——叫“抄四旧”;第二次是抄作品,信件与有关材料,其中包括照片。一些未发表的抒情诗,文讲所学习时的二十余本日记,朋友信件及让我代为保存的底稿、爱情诗,我都已付之一炬。所以,除了一些共知的“毒草”,没有得到什么新的“罪证”。照片有少奇同志形象的两份小放大的,我忍心撕去了半边,后来抄的物品归还时,这两份不完整的照片也归还回来了。当时我与老伴主要想把那张中型放大的,怎样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我们两个想了很久,竟没有想出个办法。老伴说:“还是我想办法吧!”她临时放在一抱衣物的中间,待想起好主意时再藏起。不料,抄家突然进行。这一次抄得很有水平,我最担心丢失的一包发稿剪报与出的书的样本,也被从孩子床底下搜了出来。照片是一张不少地被搜去了。他们没在意衣物,老伴也忘了那里边还夹带了什么。就这样,这张照片便平安地过了关,以完整的形式保存到了现在。没想到“没办法”竟是最好的办法。世上有多少这样偶然的幸运。所以,五十年前的这张照片,当今天再端详时,尤感到珍贵。